

晚清

闽都文化之西传

——以传教士汉学家卢公明为个案

林立强 著



海洋出版社

晚清闽都文化之西传

——以传教士汉学家卢公明为个案

林立强 著

海译出版社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闽都文化之西传——以传教士汉学家卢公明为个案/林立强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027-7702-9

I. ①晚… II. ①林…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福州市、西方国家
②卢公明(1824~1880)—生平事迹

IV. ①K295.71②B979.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4696 号

责任编辑:张 荣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16.75

字数:330 千字 定价:58.00 元

发行部:62147016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次

绪论	1
第一章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世“东学西渐”	14
第一节 18 世纪以后的“东学西渐”	14
第二节 美国早期传教士汉学家群体与汉学研究	21
第三节 晚清西方传教士对福州地区的记载	28
第二章 卢公明与晚清闽都文化之渊源	34
第一节 卢公明西传晚清闽都文化的个人条件	34
第二节 卢公明对晚清闽都文化的体察与描述	43
第三章 晚清闽都政治文化之考察	61
第一节 政治制度	61
第二节 官方仪式	68
第三节 官场腐败	76
第四章 晚清闽都商业文化之考察	80
第一节 茶叶贸易	80
第二节 城市商业	94
第三节 传统产业	110
第五章 晚清闽都信仰文化之考察	118
第一节 三教信徒	118
第二节 民间信仰	126
第三节 祖先崇拜	137
第四节 迷信活动	151
第六章 晚清闽都民俗文化之考察	161
第一节 岁时节日	161
第二节 婚嫁丧葬	167
第三节 表演艺术	175
第四节 口碑文化	182

第五节 积德行善	190
第六节 陋习恶俗	201
第七章 晚清闽都文化与早期犹太文化之比较	221
第一节 民俗文化之比较	222
第二节 信仰文化之比较	234
第三节 商业文化之比较	240
结 语	244
参考文献	247
后记	262

绪 论

“东学西渐”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以至于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发明了“东化”一词，并预言“21 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②。“东学”的概念，虽然不同学者的表述不同，意思却大体一致，即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东方（东亚）文化。但学者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东学”的色调并非是统一的，且不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仅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言，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极其明显，著名的有岭南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三秦文化等。而所谓的“东学西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之西传。本书以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为个案，以其煌煌汉学著述为基础，探讨晚清时期中国与西方交通的重要区域文化——闽都文化之西传，以期为这种地域性的“东学西渐”研究添砖加瓦。

在正式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本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闽都文化的释义与特点、晚清以前闽都文化的发展历程、晚清时期闽都传统文化的定型、晚清时期闽都文化近代化的发展以及闽都文化的向外传播等问题作一阐释。

一、本书研究的背景及重要意义

1. 选择卢公明作为个案研究的意义

卢公明，美国汉学家，也是 19 世纪 50—60 年代福州地区最著名的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之一。他在华活动的主要范围是在福州地区。据当时西方人士估计，广州人口有 100 万左右，福州人口约达 25 万，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城市中，福州影响力居第二，这对于要扩大基督教影响的传教士们来说，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美国基督教新教差会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简称 A. B. C. F. M）决策机构决定将福州作为其在华任教事业的一个基地，派员奔赴福州从事传教工作。受美部会的差遣，卢公明于 1850 年 5 月 31 日来此开始传教生涯。其后，美以美会

^①详见季羨林，王宁主编：《东学西渐丛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乐黛云主编：《东学西渐丛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②季羨林：《东学西渐与“东化”》——为《东方论坛》“东学西渐”栏目而作，载《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 期。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英安立甘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等差会也纷至沓来, 福州成为当时各国差会在中国的传教中心之一, 是晚清中国新教传教的重要基地和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极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卢公明还曾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活动, 在华传教前后长达 20 余年之久。他在兴办教会学校、传教书籍的编撰和发售工作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其传教成绩在美部会福州传教团中名列前茅。

19 世纪是西方人对中国进行大量报道的历史时期, 它们从各种视角对中国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和介绍, 并出版了各类作品。其中 70 年代前的主要有: 德庇时爵士 (Sir John Francis Davis) 的《中国概述》(China) (1836)、李太郭 (George Tradescant Lay) 的《实际的中国人》(The Chinese as They are) (1841)、麦得士 (T. T. Meadows) 的《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杂录》(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1847)、《中国人及其反叛》(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1856)、约翰·斯卡特 (John Scarth) 的《在华十二年》(Twelve Years in China) (1860) 等, 上述这些作品均出自非传教士之手。而传教士们更是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在这方面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如麦都思 (Medhurst) 的《中国: 目前的现状和未来的前途》(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1838)、郭士腊 (Charles Gutzlaff) 的《开放的中国》(China Opened) (1838)、卫三畏 (Wells William S) 的《中国总论》(Middle Kingdom) (1848)、美魏茶 (Milne) 的《在华生活》(Life in China) (1857)、黎力基 (Lechler) 的《中国论集》(Acht Vorträge über China gehalten an verschiedenen Orten Deutschlands und der Schweiz) (1861)、倪维思 (Nevius) 的《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 (1869) 等。与上述作品相比, 卢公明的代表著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①与同期的其他描述性著述相比, 该书材料很有代表性, 被认为是同类作品中涉及中国人 (实际上就是福州人) 社会生活方面内容“取材最为丰富的一本书”^②, 是一般的描述著作中“最好的和最具综合性的著作”^③, 极具参考价值, 其对福州地区及闽都文化的描述十分深入细致。此外, 通过对卢公明的著作进行研究, 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作为近代美国汉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以传教士为主的汉学研究群体中一员的重要地位。卢公明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现象的细致描绘, 为我们了解晚清福州社会的全貌提供了另一独特的视野。

①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ir religious, government, educational, and business customs and opinions, with special but not exclusive reference to Fuh - Chau*,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65. (以下简称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② [英] 约·罗伯茨著, 蒋重跃, 刘林海译: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9 年, 第 90 页。

③ [美] M. G. 马森著, 杨德山等译: 《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9 年, 第 40 页。

卢公明本人在福州传教多年,与福州民众之间的相处总体来说是融洽的,对福州人民是友好的。如果说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的话,那只是两种文化、两种信仰的冲突,是由晚清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其传教士的身份使然。作为一个传教士,他经历了许多坎坷,而作为一个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者和汉学家,他却是成功的。他所撰写的描写福州人社会生活的著作以及他回国后致力于向美国人民介绍闽都文化的举动,使西方对中国,尤其对福建和福州有了一定的了解。时至今日,他的汉学著作仍被西方汉学界奉为 19 世纪中国学研究的经典。从这点意义上说,卢公明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他的影响所在,对闽都文化的西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对卢公明这一个案出发对闽都文化向外传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是很有必要的。

2. 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

闽都文化历来是福州发展的重要源泉和不竭动力,闽都文化的巨大魅力亦引起了福州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这一时代背景下,福州的建设、发展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结合福州的历史进程、现实发展的文化体系,从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层面上为福州的建设、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能量。近年来,中共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大力推进“文化兴市”战略,一方面倾力打造昙石山文化、三坊七巷文化、船政文化以及寿山石文化等四大文化品牌,并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闽剧、茶亭十番音乐、福州评话、脱胎漆器等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对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闽都民俗文化大加提倡,举办“闽都民俗文化节”,兴建“闽都民俗文化大观园”。另一方面组织力量研究宣传闽都文化,成立研究机构,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刊物和书籍。例如,闽江学院成立“闽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召开闽都文化研究会,结集出版《多学科视野中的闽都文化》一书;福州市文联成立“闽都文化研究院”,公开发行院刊《闽都文化》,并举办多次“闽都文化论坛”;组织一批专家学者编写出版“福州民俗文化丛书”(包括《福州习俗》、《福州世家》、《福州古厝》、《福州熟语》、《福州老街》、《福州地名》、《福州老铺》、《福州老行当》等八本);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与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闽都文化研究》(上、下);筹备计划在 2010 年成立“闽都文化研究会”等。另外还举办“闽都大讲坛”,邀请各地专家进行学术演讲和交流;又成立“闽都乡学讲习所”,主要对福州的外来人员进行闽都文化宣传。这些由政府积极推动“闽都文化热”,特别是大批专家学者对闽都文化的深入广泛的研究以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标志着一个新的以福州地域为研究对象、具有独立学科性质的“闽都学”的兴起。

这种以某一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我国主要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现在出现了如上海学、岭南学、徽州学、扬州学、温州学、泉州学等。其中福建省的泉州学是国内地方学研究最早的学科之一,其发端不迟于 1926 年,至今已有

80多年的历史。同属闽省泉州学的崛起及发展为福州市的地方学——“闽都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就“闽都学”兴起的意义而言，主要有二：第一，有助于以现代视野全方位审视历史的福州，系统性地开掘福州的历史文化资源，以此来深刻地把握福州的历史文脉、历史精神，创新地传承福州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为增强福州的历史质感、传统韵味、文化底蕴、地域色彩提供一份不可或缺的思想支撑、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南。第二，有助于以学科力量推进现代福州的特色建设。所要建立的“闽都学”是以阐释、建构福州地域本体性为其内容和属性的学术，是以回溯、把握历史福州，献计、规划现代福州、展望、构想未来福州为其学术责任和使命的。这种“闽都学”的建立将以其学科智慧为建设有特色的现代福州提供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坐标和资源，同时也将为现代福州的决策者、管理者提供一份难能可贵的决策智慧、管理思维。^①另外，由于福州长期作为福建首邑，是中国古都之一，因此“闽都学”的兴起还具有更深远的意义。第一，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古都学。1983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前会长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他认为，建立中国古都学有很大的必要性：首先可以了解研究都城，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其次能够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此外，可根据古都演变的规律，提出相关论证，为当前建设现代化城市作参考。^②就福州这座经历了2200多年发展、长期作为福建中心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展开闽都学的研究得天独厚，意义重大，亦能大大提升福州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地位与形象。第二，有助于福建文化形成像其他省份那样鲜明的代表性文化，如河南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代表，广东文化以岭南文化为代表，浙江文化以吴越文化为代表，河北文化以燕赵文化为代表，山东文化以齐鲁文化为代表，四川文化以巴蜀文化为代表，陕西文化以三秦文化为代表，等等。因此，建立在长期作为福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福州的基础上的闽都文化理应是福建文化的代表性文化^③。这不仅对于福州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福建的发展亦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闽都学”刚刚兴起，其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比如，目前的“闽都学”对闽都文化现存形态的研究较多，对于其历史形态的研究较少；对闽都文化内部元素的研究较多，对于其传播形态特别是向西方国家的传播的研究较少；对闽都文化精华成分的研究较多，对于其糟粕成分研究较少；对闽都文化的自我论述研究较多，对于其所受到的外人（西人）的论述的研究较少，等等。这些缺憾既不利于“闽都学”的发展，又不利于闽都文化的发展，更不利于福州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卢公明的著述特别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其内容

①李仲才：《关于建立“闽都学”的断想》，《闽海神州》，2005年12月27日。

②刘锡涛：《也谈建立“闽都学”》，《福州晚报》，2006年1月16日。

③李仲才：《谈谈开展“闽都文化的中心地位”的研究》，http://www.ccmedu.com/bbs/dispbbs_39_91913_1_1.html

涵盖了政治、教育、军事、商业、宗教、习俗、语言、艺术等各个方面,堪称一部展现在西方人面前的晚清闽都文化百科全书,历来被美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民间奉为圭臬之作,成为美国汉学界研究学者案头必备的书目之一。卢公明还在书中对晚清闽都文化的阴暗面特别是陋习恶俗进行了揭露与抨击,并将晚清闽都文化与《圣经》所载早期犹太文化进行比较,进一步揭示了晚清闽都文化的独特之处。卢公明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对晚清闽都文化所作的观察和评论则给我们研究闽都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些对于今天的闽都文化研究特别是“闽都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闽都文化的释义与鲜明特点

所谓闽都文化,是由闽都人即福州人创造的文化。

闽都即今福州市,其辖区范围五代以前多有变更,五代以后,其主体辖区范围基本稳定在闽江下游入海口的福州平原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网密布、交通便利。关于福州城最早的文字记载始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闽越国王无诸在今福州市冶山一带建造都城——“冶城”。此后的2200多年中,福州或为郡治,或为州治,或为府治,或为省会,始终居于福建的政治中心地位,这亦是福州被称为闽都的原因。与此同时,福州城屡经扩建、拓展,从闽越王的冶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扩建的子城到唐末王审知扩建的罗城、五代闽国的夹城,福州城的规模趋于定型。此后,宋代又增筑外城,明代重砌府城。优越的地理位置、作为福建政治中心城市地位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促进了福州经济、文化的繁荣,也奠定了闽都文化在闽文化中的核心、主导地位。

闽都人即福州人,“一般是以省会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的居民。”^①这种划分的依据是闽都方言,即福州话。福州话是在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入闽之后在闽江下游及闽东地区逐渐形成的以汉语为基础且具地方特色的方言,是闽江下游的旧福州府“十邑”的共通语,是整个闽东地区的代表性方言,通行于今福州市所属5区2市6县和宁德地区所辖的2市5县等闽东方言区以及浙南和闽北的部分地区。然而,从族群构成看,福州人的构成较为复杂,从历史上看,有早期闽越族后裔,有西晋永嘉之乱后多次分批南下的中原移民,陈、林、黄、郑是中原的四大故姓。此外,八闽中的建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兴化军等地也有或多或少的人相继进入福州定居。因此,福州人是入闽的中原汉人融合、同化了古闽越人之后又接纳了其他各地的移民,逐步形成的一个具有独特人文特征的汉族族群。这个族群的形成始于汉末三国时期,结束于唐末五代时期,迄今亦在不断发展中。

因此,闽都文化是由闽江下游和闽东地区一带及其他地区操福州方言的居

^①陈支平:《福州六大民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民，在长期的发展演化中共同创造的一支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分布范围是以闽江下游的福州平原为中心，辐射至周边的闽东、浙南、闽北等地区。

闽都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上至深奥学术，中至经济建设，下至民风民俗，并具有鲜明的特点。黄启权认为，闽都文化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延伸性、刚烈性、渊博性、开拓性等特点^①；薛菁认为，“闽都文化是一支兼具内陆性与海洋性特质的复合型、综合性的地域文化”^②；薛菁与陈永正进一步认为，“闽都文化内含着一种和合儒雅的精神气质、一种崇礼重教的文化传统、一种稳健谨慎的生活态度、一种经世务实的价值观念，从而锻铸了包容和合、稳健谨慎、爱国自强、经世务实的闽都精神。”^③ 这些全是褒扬的词句，无疑带有强烈的弘扬主旋律、激励精神道德的主观意图，但不可否认的是闽都文化还有许多难以褒贬甚至糟粕的方面，其中就有长期为人所诟病的所谓福州人的“虾油味”性格。福州有一种别处没有的调料，品名叫鱼露，俗称“虾油”。这种调味品，几乎成为福州饮食文化的一大标志。著名文化人曹聚仁先生曾把具有下述这种文化性格的福州人称为“虾油味太重”：“一、福州地关海洋，可是居民性格全无海洋气味，倒还是大陆的气味很浓；二、福州为中国的海军发源地，可是居民全无海盗风度，也不崇拜海上英雄；三、福州地在南方，却无南方人的热情，也不爱去冒险。”但是与其他很多民风排外的文化不同，福州人虽然缺乏“海洋气味”，但对于到福州的西人和异域文化却一般并不排斥，甚至显示出极大的宽容和欢迎态度。例如，明中叶以后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在福州传播天主教可谓得心应手，被称为“西来孔子”，从他于福州士大夫谈论教义的《三山论学记》可以看出，他与福州士大夫的关系极为融洽，71位士大夫向他赠诗（后结集为《闽中诸公赠诗》），说明当时福州的士大夫对外来文化的欢迎。近代以来涌入福州的外侨更多，由于他们主要聚居仓前山一带，所以有“仓前山看番仔婆（外国女人）好相”的说法，并有“走马仓前看走马，泛船浦内泊番船”的顺口溜，至今仓前山一带还保留着许多五口通商后建造的教堂、领事馆、外商洋行、小洋房等带有西方列强特色的建筑。福州人的这种性格^④为晚清时期闽都文化兼收并蓄西方文化大有益处。

三、晚清时期闽都传统文化的定型

此处所谓传统文化，是相对于晚清以降传入福州的西方文化而言。经过长期的

① 详见黄启权：《闽都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色》，载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闽都文化研究》。

② 薛菁：《闽都文化若干问题探研》，《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③ 薛菁，陈永正：《闽都文化的基本特质与精神》，《新华文摘》，2008年第2期。

④ 关于福州人性格的详细阐述，见何绵山：《闽文化续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9—82页。

发展,时至晚清这些传统文化已基本定型,有的走向没落,有的则有了新的发展。

比如,在民俗方面,晚清时期福州传统的岁时节俗、婚嫁习俗、丧葬习俗等经过长期演变已经基本定型。晚清福州除了全国性的除夕、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祭灶等,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拗九节:又称“后九节”、“孝顺节”。每逢农历正月二十九,家家户户都用糯米、红豆、枣子、栗子、花生、白果、莲子、百合等煮成甜粥,用来祭祖或馈赠亲友,已婚之女除此之外还加上煮熟的鸡等其他食物,送回娘家,孝敬父母。晚清福州的婚嫁习俗繁琐而多样,有“问字”、“合婚”、“下大贴”、“上半礼”、“下半礼”等17项之多。在操办这些程序时,福州各地区的做法又有所不同,比如福清“迎亲”时有“拦花轿”的独特习俗:迎亲回来路上,人们可以用条椅等拦住花轿,只有让拦路者满意,才让通过,新郎新娘不得生气。一路上拦的人越多,越说明新娘的才貌闻名远近,新郎也就越光彩。其他有的地方还有“避冲”、“关新人房”等习俗。晚清福州的丧葬习俗繁琐而奢华: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在丧葬礼仪程序方面都要做到齐全,如入厅、入殓、出殡、回舆等都是必须的。“做七”在福州丧俗中最为重要。福州话“七”与“漆”同音,所以福州夫人棺材要上七道漆。人死后每七天就要一“祭”,称“做过七”。至四十九止,一共要做七次。死亡后第七天,称“过头七”,也称“孝男七”,由孝男出资主持。请道搭坛诵经,擂锣鼓和钟磬,向城隍爷报亡。“二七”是“内亲七”,由族内六亲九眷出资延道诵经。“三七”又是“孝男七”。“四七”是“亲友七”,由朋友出资延道诵经。“六七”是“孝女七”,由出家女出资延请尼姑诵经。“五七”或“七七”是规模最大的活动,届时发讣告通告亲友,请其参加唁吊。吊唁者向亡灵叩拜,孝男孝女在旁陪祭。酒席后开始出殡,棺柩后紧跟一队手持“哭丧杖”的孝男孝孙,尾随女眷和其他人,一路哀泣。安葬完毕,“哭丧杖”插在墓头。送葬回来的队伍叫“回舆”,灵堂供上逝者像后,所有送葬者逐个向亡灵拜别,孝男孝女在一旁伴灵志哀。结束后,逝者家属须向亡灵早晚供奉食物,到百日方才停止。

又比如,晚清福州传统的政治、教育、宗教形态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开始停滞甚至没落。晚清福州作为福建政治中心兼闽浙总督、福建巡抚驻蹕之地,堪称地方权力中心。但总督、巡抚名为上下级,实为互相牵制监督,其下又设承宣布正使司(藩司)、提刑按察使司(臬司)一级提督学政。另外,还设有盐法道、储粮道等专门性官员。道之下设府,有知府一名,又称太守,掌管府内大小事务。福州则为福州府,下辖十县,即闽县、侯官、长乐、福清、连江、永福、古田、罗源、闽清和屏南十邑。知县的辅佐官有县丞、主簿,分班钱粮、户籍、巡捕等。此外,福建为边防的重要省份,因此清政府在福州设有驻防八旗,其长官为将军或都统,下有副都统,都为满族人。这种政治机构叠床架屋,晚清福州官场腐败成风,人浮于事,沆瀣一气,怪相连连,清政府在福建的统治危机日益严

重。但这种弊端重重的政治结构几无变化。这是因为清承明制并强调遵循“祖宗之法”，因此晚清福州政治如同其时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呈现出保守态势。这种保守的政治态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专制统治的没落。清代福州教育发达，有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四大书院，福建全省进士人数为1401名，而福州府考中进士为730名^①，占全省进士总数的52%强。但时至晚清，福州教育一落千丈，四大书院辉煌不再，这是因为福州教育的发展和福州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是在科举制度这一教育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科举考试成为学子努力学习和奋斗的目标和动力，而书院则成为科举的附庸。例如，四大书院之一的正谊书院只有举人才能进入；鳌峰书院起初以讲学为主，后罢讲学，改为考课^②，考课内容、方式直接与科举考试接轨。除了书院之外，尚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私塾、书堂，但其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更好地进入社会，发挥作用。学生不学数学、地理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只学习孔孟经书。因此，晚清时期，福州传统教育随着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没落而走向衰败^③。晚清福州的传统宗教也难挽颓势。以道教为例，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本土宗教的代表。素有“东南山国”之称的福州，其高山深壑、幽谷川流、林木葱茏，是方士和道士垂爱之地，吸引着他们来此修炼。福州道教经过隋唐五代和宋元的发展，在南宋达到鼎盛。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福州道教逐渐开始衰微，特别是有清以来实行尊喇嘛黄教为国教，限制道教的政策，使得正统道教更是一蹶不振，代之而起的是世俗道教。时至晚清，世俗道教已经逐渐渗透到民间宗教中，成为民间宗教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道士阶层的演变，住宫道士日益减少，道士大多走向社会，以操办法事为职业，即“道士衍为一种宗教职业者，做功德道场成为养家糊口的手段”^④。因此，晚清时期福州的道士阶层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正规的道士，福州方言称为“to-ing”；另一类道士福州方言为“duo-nai”，即世俗道人、职业道士。

再比如，晚清福州传统方言、戏曲、工艺等有了新的发展。福州方言，即福州话，如前所述其基础是闽越古语，历史上自西晋以来中原汉人多次南迁，带来了包括古汉语在内的中原文化，经数百年的融合演变，在唐末形成。但晚清以降福州方言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了新的发展，比如出现了“做都统”一词，意为白吃白喝。这是因为清代在重要省份建置驻防八旗，设将军或都统为长官，二者并不并设，凡设将军处，其下只置副都统，但都以“都统”称呼。通商以后，将军兼理海关，有额外收入，副都统除额定薪俸外，毫无所得。省城百官聚

①毛晓阳：《清代福州进士时空分布与福州全省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载陈永正主编：《多学科视野中的闽都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

②书院考课每月举行两次，其中一次由地方官命题、阅卷，称官课，另一次由书院山长命题、阅卷，称师课。

③刘海峰，庄明水主编：《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④何敦铎：《福州历代道教探略》，载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闽都文化研究》。

会饮宴，副都统按惯例不分摊份金，故福州人称白吃为“做都统”^①。福州戏曲，简称闽剧。闽剧是明代末年的儒林戏子和清中叶以来的江湖戏与平讲戏这三种不同艺术风格的剧种相互融合，并吸收了徽戏和昆曲而形成了以唱逗腔的儒林戏为主的综合性多声腔剧种。晚清时期特别是从光绪年间到辛亥革命前是闽剧形成、发展的“前三合响”，此时，在闽班的演出中，既能听到儒林班的唱腔曲调，也能听到江湖班、平讲班的唱腔曲调^②。寿山石刻，简称寿山石，是福州的重要传统工艺。寿山石品种繁多，晚清时期，郭柏苍在《闽产录异》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寿山石种，确立了以“坑”为目，分为田坑、水坑、山坑三大类，两百余种，其中以田坑石最为名贵。寿山石开采在福州已经有2 000多年的历史，唐宋时期福州的寿山石雕刻技术发展成熟，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元明之际寿山石印章成为中国印章艺术的主流，清代初期寿山石雕发展鼎盛，雕刻高手辈出，许多佳作进贡宫廷秘藏。寿山石雕分圆雕、浮雕、镂雕、薄意和印钮五大类，有印章、文具、烟具、花瓶等用品，也有花果、人物、动物、古兽、山水等陈列品，品种近千种。至同治光绪年间，福州寿山石雕分流成“西门”和“东门”两派。“西门”派石雕艺人以刻制印章为主，主要集中在福州西门凤尾一带，店肆则广泛分布于城内总督后，“东门”派从业人员众多，技师遍及福州东门外后屿和周围的横屿、樟林、寿岭等村落。^③脱胎漆器亦是福州人继承中国悠久的漆器文化而创造的一种工艺美术品，它以脱胎技法和髹饰相结合，质地轻巧，造型美观，装饰典雅。其首创是清乾隆年间髹漆大师沈绍安，沈绍安得漆艺代代相传。光绪二十四年（1898），沈绍安五代孙沈正镐脱胎漆器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获得金牌，^④从此福州漆艺在国际崭露头角。“五口通商”后，福州脱胎漆器外销随日剧增，除传统产品外，也制作适合外国人需求的器皿，如烟具、酒具、咖啡具、西式花瓶等。

四、晚清时期闽都文化近代化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福州作为五口之一被迫对外开放，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是被动的，主要通过来榕洋商和传教士进行；另一方面是主动的，主要通过洋务派等进行。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晚清闽都文化的巨大变化，开启了闽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

洋商来到福州首先造成了福州茶叶贸易的大发展和福州港的振兴。众所周知，英国要求清廷开放福州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要更为便利地从事茶叶贸易，因为西方所饮之茶多为武夷茶。从武夷山到福州比到广州，运费和转手费可大大降

①陈易园主编：《福建编年史》，福建省博物馆筹备处，1958年，刻写油印本。

②福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志》，第八册，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

③林璧符：《闽都文化源流》，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第148-149页。

④林璧等：《闽都文化源流》，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第150页。

低，因此英国十分觊觎这个市场。虽然福州刚开埠后对外贸易市场几乎一片沉寂，福州民众未敢与“夷人”贸易^①。但是到1853年情况骤然发生转折。该年，因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福建茶叶从陆路运往上海和广州的茶路被切断，福州港成为福建茶叶唯一的出口口岸。此后，福州茶港迅速崛起，茶叶贸易日渐兴盛，在19世纪后半期，福州港的地位举足轻重，与上海、汉口旗鼓相当。

茶叶贸易和茶港的兴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是促进了农村茶叶生产的扩大，刺激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给自足经济的萎缩，同时推动了茶叶加工工业的兴盛，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扩大和繁荣，例如，砖茶制造业、茶油业、熏茶业等的兴起。而在近代工业方面，福州最早出现的近代工业都是和茶叶贸易的繁荣有很大关系，首先是外国资本，为适应购运茶叶船舶的增多，英国在福州设立的船舶修造厂，俄国在福州及福州附近设立了福州砖茶厂。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也是从福商建立砖茶厂开始的。

由于“海禁既开，茶叶日盛，洋商采办，聚集福州”^②，茶叶贸易的兴盛也带动了其他贸易活动的开展。19世纪50年代后福州的商业变得十分繁荣，外国纷纷在福州设立商业机构，据闽海关贸易报告统计，1867年，福州已有15家英国洋行，3家美国洋行，2家德国洋行，1家布津吉商行，3家银行，2家货栈和1个印刷局^③。一方面，洋行、茶行等的大量进驻促使了福州买办阶层的兴起。另一方面，外国资本的涌入也改变了福州的金融格局。开埠之前，福州的金融组织主要为钱庄、票号、当铺等，经营着银钱兑换、货币存放等业务。随着各国银行在福州开展业务，银行通过装票和拆票制度牢牢地控制了钱庄，也控制了福州的金融市场。这也奠定了福州新金融格局的基础。当然，在这种格局下福州的金融业也在逐渐走向近代化。除了钱庄自身在逐渐发展以适应环境变化，另外，华资银行，如“永丰官局”、中国通商银行福州分行、大清银行福州分行等的设立也在促进福州金融业的近代化。

传教士带来的冲击亦是多样而深刻的，首先是基督教的大流行。虽然基督教在福州传播的历史悠久，但真正大规模传播却是在晚清来华传教士们受到列强武力和条约保护之后。来福州传教的基督教派别众多，宗派林立。^①西医的传播。传教士积极从事医学传教，开办西式诊所，客观上把西医知识传入福州；^②新式学校的建立。西方传教士兴办的教会学校，客观上成为福州近代新式学校的开端，涵盖了从幼稚园，初小，高小，预中，完中，再到高等院校的完整的教育体

① 鄯永庆编选：《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问题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② 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73页。

③ 李瓦特：《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1867年）》，载福州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系；③近代报刊、杂志的出版与西书的翻译。传教士创办了福州最早的铅印出版社，出版了福州近代意义的最早书籍，促进了西学在福州的传播。传教士们的大规模涌入带来了新式医疗、教育以及出版事业等西方世俗文化，促进了晚清福州社会的深刻变革。

而福州人主动吸取西方文化以推动闽都文化近代化的业绩亦非常巨大。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民族英雄、福州名人林则徐就积极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与林则徐同时的福建巡抚徐继畲更是编纂了规模宏大的《瀛环志略》，对世界作全面的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巨痛促成洋务运动启动，真正开始了“师夷长技”的实践。1866年（清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形成了名垂青史的福州船政文化。以船政学生为中心，晚清时期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福州地区迅速崛起一大批杰出人物，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外交家、思想家、翻译家，几乎囊括了各个领域，故有“晚清风流出侯官^①”之说，闽都文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五、闽都文化的对外传播

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随着明代末年以后福州人大量涌入台湾并走出国门，闽都文化也通过福州人向外迁移以及外人来榕等途径而向外传播，在海峡两岸并在南洋、日本、欧美等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

一是向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向台湾传播。整个福建地区的移民趋势大体是全国其他省区的民众向福建迁移，福建的民众则向台湾和海外迁移，福州地区尤其如此。因此，历史上闽都文化向全国其他省区传播的例子并不多见，但福州长期作为福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闽都文化向福建省内其他地区以及福建周边部分地区传播的迹象还是很明显的。更重要的是，闽都文化向曾是福建一府的台湾的传播源源不断，源远流长，影响巨大。历史上，早在三国时期，福州人就开始赴台。考古发掘显示，台湾出土的许多宋代瓷器中，就包括连江浦口窑和闽侯油窑的青瓷。明清时期，福州地区的阿靖姑信仰与五灵公（五帝）等民间信仰传入台湾，皆信者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正式设府到割台与日的210年间，任台湾儒学教授、教谕、训导的福州人达192人，还有许多虽不是福州人，也是福州各书院的学员或是从福州府、县学中调任的。由此可见闽都文化对台湾影响之一斑。

二是向国外传播。福州人自古远涉重洋，旅居海外。早在汉代，就有先民移居菲律宾群岛。唐代，已有先民到东南亚和日本经商，其中少数人定居了下来。

^①侯官是旧县名，其辖境主要包括今福州市区和闽侯县的一部分，清人多以侯官代福州。

五代闽国时，去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经商、做工的人增多。据考证，日本镰仓时期“大佛样”、“天竺样”的建筑，就深受福州华林寺建筑风格的影响。南宋末年，不少人更因战乱迁徙海外。明代洪武年间，封“闽人三十六姓”（大多是福州台江河口一带人）赴琉球，移居那霸“久米村”，至今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还保留着福州的传统。后来，福州成为中国与琉球往来的唯一港口，历次受命册封琉球国王的正副使中，谢杰、齐鲲、林鸿年、赵新等多人都是福州人。他们带去了福州人，也带去了闽都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中琉经济、文化交流。琉球的线面制作、空手道等都源于福州。明中叶以后，很多人沿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去东南亚谋生。明末清初，因“迁界”又有许多人避居越南、日本和东南亚。至鸦片战争前，福州旅居国外的华侨约有几万人。抗日战争前，福州旅外华侨已有20多万人。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州人向美洲、欧洲、澳洲等地广泛发展，至今，福州籍海外侨胞和华人达250万人，分布东南亚、欧、美、澳、非等100多个国家或地区。福州人的杰出代表林则徐铜像已竖立在美国纽约街头，纽约的“唐人街”，随处可以听到福州话。

在闽都文化向国外特别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传播过程中，来榕西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旅行家、商人、外交官、学者、传教士等，通过他们的通信、演讲、回忆和著述等方式源源不断将闽都文化的方方面面向他们的同胞传播。在这场来榕西人向其同胞传播晚清闽都文化的浪潮中，来榕的基督教传教士是一个特别抢眼的群体，而卢公明则无疑是这个群体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六、本书的基本框架

本书所引资料均出自卢公明手稿、书信、著述等第一手外文原始资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书主人公是一名传教士，他的书中充斥了大量的传教内容和基督教教义。因此，本书在材料的取舍上，作者主要选取了与闽都文化相关的内容，而对其与传教有关活动只是作为背景介绍，具体的描写则基本略去。据此，本书内容共分绪论、正文七章以及结语九大部分。

绪论首先阐述了以卢公明为个案研究晚清闽都文化之西传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地域性“东学西渐”的研究，而且能够促进“闽都学”的健康兴起。接着对闽都文化的释义、特点、发展历程、晚清闽都传统文化形态、晚清以降西方文化对闽都文化的冲击以及闽都文化的向外传播等问题作具体的阐释，以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卢公明西传晚清闽都文化的内涵和背景。

第一章“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世‘东学西渐’”，包括三节，主要论述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在18世纪以后的“东学西渐”，特别是在美国的汉学研究中和对晚清福州地区的记载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卢公明西传晚清闽都文化的背景特别是文化学术背景。

第二章“卢公明与晚清闽都文化之渊源”，包括两节，首先介绍卢公明在美